

全球对话

Global Dialogue

Tahrir Square 的革命时刻

Mona Abaza

阿拉伯革命： 谁是行动者？

Sari Hanafi

横滨— 希望之港

長谷川公一

- > 挑战世界主义
- > 不平等
- > 墨西哥的执行委员会会议
- > 无国界社会学
- > 土耳其社会学会20周年
- > 欧洲各国的社会学会
- > 历史一隅：1982年，墨西哥
- > 人权：社会学家犯了什麼罪？

NEWSLETTER

4
GDN

第一卷 / 第四期 / 2011.4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 主编的话

从上一期到现在，世界变了很多。开罗受到全球的瞩目。阿拉伯的暴动—我们还没办法确定是不是革命—才刚刚发生不久，让大家无法预测社运何时会发生。我们比较了解它如何散布、展开、存续。因此我们有两篇主要谈革命过程的文章：Mona Abaza认为那就是于2011年1月和2月时在Tahrir square里面及周遭所发生的事情；Sari Hanafi则检视了突尼西亚和埃及要求社会改革的行动者组成。

第三篇文章把我们从人类的动荡带到了天然的地震中，是有关日本大地震及相关的核能意外。环境社会学者长谷川公一15年来不断质问是否真要等到另一个车诺比事件发生后，日本才愿意改变现今的能源政策呢？答案我们也不晓得。作为2014横滨大会的当地筹备会主席，长谷川教授在墨西哥向执委会报告了日本如何应变这次的地震与海啸。我们全文刊出。对此，执委会再次保证2014年大会将会圆满成功。

我们也登出了执委会在月21-25日的会议记录，以及Raquel Sosa El í zaga副会长所主办之讨论不平等的国际会议。Jennifer Platt在历史一于中记录了1982年墨西哥世界大会的情形。这是ISA第一次在“第三世界国家”举办会议，也开启了全球社会学这样的议题。例如，这期的Sujata Patel也从许多不同民族的观点去剖析全球社会学和世界主义。此外还有来自欧洲社会学会的报导，也有土耳其社会学会的介绍，以及无国界社会学美国分会的简介。最后则跟各位报告了土耳其和匈牙利的社会学家遭受人权迫害的例子。

我们持续去拓展我们的读者群。现在我们也脸书了，网页也更新了，加入了Digital Worlds的部分。透过Sari Hanafi、Mounir Saidani、Ishwar Mod的帮忙，全球对话也发行了阿拉伯和印度文版本，总共有9种语言。社会学已经动起来了！

> 本期内容

主编的话	2
Tahrir Square的革命时刻	3
阿拉伯革命：谁是行动者？	6
横滨：希望之港	9

> 辩论

挑战世界主义	12
不平等	14

> 会议与学会

墨西哥的执行委员会会议	15
无国界社会学	17
土耳其社会学20周年	18
欧洲各国的社会学会	19

> 特集

历史一隅：1982年，墨西哥	8
人权：社会学家犯了什麼罪？	20



Cover Photo by Mona Abaza

ISA website

facebook



Tahrir Square 的和平抗议
Photo by Mona Abaza

> Tahrir Square 的革命时刻

by Mona Abaza, American University of Cairo

1月25日在埃及的开罗上演了一场关键的示威活动，而我人正好在场。第一场示威活动我并未参与。我已经积极地介入政治已经好几年了，而我必须承认，我是因为在好多次的示威活动中看到了许多的暴力事件，所以才开始对街头运动却步的。

从第一天开始，政府就对示威者进行残酷的镇压。从第一天就参与活动的朋友回忆到整起暴力事件：橡皮子弹、水柱、催泪瓦斯等都是被用来对付示威者的武器。整座城市都起

火了，催泪瓦斯的浓浓臭味弥漫了好几天。到了1月25日，报导指出有3人死亡，多人受伤。

穆巴拉克已经瘫痪了整座城市的铁路。这个愚蠢的控制方式一点也没有办法阻止抗议民众继续向城市涌入。的确，1月25日后，街头上的群众一天比一天多，示威活动也越来越顽强，人们也陆陆续续地占据了开罗的所有街道。这些人都是要去Tahrir Square的，整个开罗市也因为警察局被攻击而渐渐崩毁了。此时歹徒也无所不在，抢劫事件频频发生。只

要警察越使用暴力镇压，示威者就会越坚定，人数也会越来越多。其他城市，像是Alexandria、Suez、Port Said、Mansura、Mahalla al Kubra等的情况也跟开罗类似。在开罗，示威者从Shubra、Mattariya、Bulaq、Dokki、Mohandessin Nasr City、Heliopolis等地出发，并占据了Six of October和Kasr al-Nil等桥梁，暴力冲突也都被记录下来。对于政府的暴力镇压，不满的情绪日渐升高，反对的信念愈易坚定。大家都说这次事情将有所不同。反对者不再恐惧，用自己的身体和集体的祈祷去抵抗警察无情的镇压。接着不久后，反而是警察由于恐惧害怕而撤退了，因为他们对于这些坚毅不拔的反对者束手无策。所以警察不敢面对强大但和平的群众力量，一下子所有警察就都跑光了。开罗市民某天一大早醒来发现居然一个警察也没有。可是接着军队便开着坦克车进驻。

许多和我一样不是政治运动者、害怕暴力事件的人，最后也都决定要游行到Tahrir Square。许多中产阶级的妈妈们一涌而入。我朋友的儿女体验到了一种巨大的人生变化。这些把他们各自的父母带到街上去的年轻人往往在第一天就参加活动了。这些人在广场找到了自我。也有许多年轻人对于学到很多和政府交手或对抗的技巧而感到很自豪。

第一次壮观的百万人运动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埃及人自己也深受影响。这是追求自由、渴望尊严的集体仪式。两



百万人和平的走上街头，走向Tahrir Square，这样盛大却井然有序游行景象简直笔墨难以形容。整个游行组织很壮观，年轻的筹画者掌握了游行的秩序，迈进并穿越广场。这点相当重要。更令人讶异的是抗议的人们彼此互相关照，所以不会出乱子。广场则被军队的坦克包围着，检查每个人的身份防止有心人士趁乱打劫，并禁止武器携入广场。在检查站那里，男人和女人被隔开，也因此由年轻的、高度自律的反政府组织者所组成的“人民委员会”所掌控住。随身背包和皮包都要接受检查，刀子、剪刀等危险物品一律没收。当政府的威胁持续增加，检查站也随着增设。整个游行广场被人民所组成的队伍小心翼翼的围绕保护着。

>2月2日的血腥镇压

对我和我女儿来说，2月的第二天是个无法忘记的日子。前一晚，穆巴拉克以邪恶且威胁的语气发表第二次电视谈话，坚持不下台，仿佛他的愤怒马上就要降临这个失控的国度。次日下午，我和我的两位朋友走向广场，我女儿则要去与友人会面。Samia建议我说可以去Pierre家，因为他那边在一栋公寓大楼的9楼和10楼，可以望向整个广场，以及Talaat Harb和Bab al-Luq等街道。大约4点的时候，政府派出的暴徒开始从埃及博物馆的方向攻击群众。我看到许多重伤的人被抬出检查站，他们头部和眼睛都被射伤。一场骆驼的战役(The battle of the camels)已经展开，然而幸运的是抗议者成功地逮捕了进入广场的骆驼和马

。那时我的两位朋友决定回到我们所处的Zamalek岛，我和我女儿开始担忧，并觉得回去的风险太大。目睹这一桩景象，余悸犹存。

大约5点半时政府的爪牙从Talaat Harb Street大量涌入广场，并开始丢汽油弹，向广场民众开枪，焚烧所有东西。他们还特别向车子开枪，好可以把车子翻过来。我们清楚地可以看见军队并未阻止这些行为，所以反政府的群众只能自卫，或是从正在整修中Hilton大饭店那找来金属物品当作防御工具。至于攻击武器则只有石头而已。整个街道上一片混乱，伤势惨重。据报导，那一夜有4人死亡，上百人受伤。很显然地真实的死亡人数比这个还高。幸运的是最后政府派出的暴徒并未得逞。

我们整晚都在Pierre家的公寓中。Pierre则忙着把刚从阳台上拍到的上百张照片上传到脸书上。而这一天也是网路被封锁5天之后第一次恢复使用。Pierre的那迷人、颓废、美好的公寓俨然成了政治犯的庇护所，地上到处都是床与毯子。

这两间公寓变成了客栈。许多法国、美国、义大利、埃及的记者和摄影师都来此投宿，甚至还包括青少年示威者的母亲，以及当事态演变得血腥暴力时来避难的年长者。广场上的抗议人士之中，有些是我大学教过的学生，看到他们，我相当欣慰，却也相当担心，尤其是知道了当他们决定要与政府抗战到底之后。我其中一个最杰出的女学生在广场上露宿4天，看起来已经筋疲力尽；有也年轻人也是我朋友的儿女。我们也会欢迎那些不认识的抗议者来公寓投宿。当暴力冲突增加后，来的人也多了，大

约50到60人，其中有些人脸部及手脚都挂彩了。

其中有一间房间里的电视声音不绝于耳，大伙都不断地进进出出这里。有些累到不行的人甚至就睡在电视前面。我们所有人都疯狂地在反复做下列两件事：在3个大阳台上徘徊，随时关注Tahrir Square、Talaat Harb、Bab al-Louq街道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跑回电视萤幕前，看新闻如何报导，好掌握政府下次镇压的讯息。Al-Jazeera频道可以让我们知道广场外围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没办法看到来自Antiquities博物馆的攻击，也没办法看到Six of October bridge那边政府的手下如何用汽油弹攻击示威民众，但是这些景象可以透过电视画面得知。而这也让我们很担心整个城市将会陷入一片火海。电视是我们唯一可以判断情事是否危险的管道。无论如何，在公寓中的所有人都对穆巴拉克同仇敌愾；我们也都同样知道：今晚的屠杀只是穆巴拉克拒绝下台的第一步而已，若再持续个一周，后果一定不堪设想。这个人已经丧心病狂了。

我们几乎所有人都保持电话开机，每一位母亲也都一直打电话给广场上的孩子们，告诉他们电视报导的内容。有些母亲乞求孩子赶快离开那里。记者也打电话给他们在冲突中失去联系的同事。

另一方面，广场也聚集了通宵镇守的人群。女人和小孩就睡在广场中间。一些嗓门大的示威者就在Omar Makram清真寺的周围大声呼喊宗教口号，其他则大声吟唱60年代的爱国歌曲。深夜里，某个特定的时间点，抗议者开始有节奏地拍打金属物品。种种的这些声音



代表了示威者的组织有多么地紧密。某种不和谐的旋律就是表示即将有危险到来。这些噪音具有警示的功用，特别是当我们把无时无刻盘旋在广场上空的直升机也考虑进去的话。

许多住在Pierre家中的妈妈们都一直在等她们的小孩离开广场。当我们在看新闻报导时，她们都哭了。一位母亲在电话中苦苦哀求她的女儿赶快放弃抗议；我则紧紧地守在女儿身边，并祈祷这一切赶紧结束。

> 蔓延效应

当我在撰写这些回忆时，我女儿成了我最好的向导，帮我努力记起2月2号之后所发生的事情。但我们却也似乎有同样的问题，就是无意识地记忆模糊。我们都认为这是因为当时情势太过于紧张、和不断地在观察广场和关注电视之间来来回回而导致。我女儿把在Pierre家的那晚，称作为超现实主义的时刻。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情很明显：就是电视画面占据了我们的脑海，影像甚至取代了真实。

若是Adorno和Horkheimer目睹了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在埃及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那么他们一定会再好好想清楚何谓文化工业以及电视所带来的庸俗化。显然，若没有卫星频道揭穿政府的面具和荒谬的谎言，这场革命不会成功。而且当网路被封锁，脸书不能使用，行动电话无效时，卫星电视更显其重要性。

未来几年，学术界必定会热

中于研究半岛电视台在阿拉伯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革命的成功也是半岛电视的成功。电视记者也毫不隐藏地透露他们对于街头革命的支持。他们灵巧的活动，聪敏地预知办公室被搜索，以及其所经历的政治迫害，无一不正在塑造他的英雄形象。

这种传染性的反抗精神遍及了突尼西亚、阿尔吉利亚、埃及、叶门、巴林、利比亚、阿曼等国，并震惊了全世界。这也显示出电视传播讯息的迅速。烧遍了阿拉伯世界的这把火有共同的根源，也围绕在尊严、认同、正义、贪腐、君主政体等议题上而展开。

埃及人向来以其机智和乐观而著名，因为如此，这场成功的革命也吸引了广大的公众和西方世界的注意。的确，这是一场流血革命，但却又不太像。电视评论员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说，对于音乐家和舞者而言，广场是一个反文化与大众艺术想象的新生地。著名的埃及讽刺notka (笑话)和最令人讶异的即兴公共表演艺术，在广场上建立了他们的全盛时期。

这场革命给西方世界上了一堂世界主义和民主的课。对于全球地南方而言，这两者已经不存在很久了，托辞通常是这些国家还不太成熟。这次革命再次证明了这两者并非西方世界的特权。当埃及68运动发生时，同时在德国也展开了关于种族基因和整合土耳其人的辩论(由偏狭的Sarrazin所发起，请见全球对话第3期，Helma

Lutz，从世界主义到公共社会学)。

或许现在还不是时机把埃及革命拿来和苏联或中国革命比较，但是让这场革命如此吸引人的，是因为脸书、手机、twitter等媒介有效地传播资讯所导致。这也揭露了这样具争议性的新科技—被认为是消费文化的产物—如何被用来帮助对抗残暴的君主政权。然而，科技终究只是媒介，和资讯不同；媒介和速度有关，而资讯才是街头上所发生的事情。许多人都对广场上年轻人所发明的口号和标语感到好奇。Manuel Castells正确地指出，网路空间的兴起开启了网络社会了一个新的面相。他论及了新的资讯语言和新的符码。这些明确的标语聚集了成千上万的群众，有些只是几个简单的字，像是“irhal”(走开)和“baatel”(非法)。这会是Castells笔下所预言的新电子符号语言或是简写语言所导致的结果吗？显然，我们无从得知。



> 阿拉伯革命：谁是行动者？

by Sari Hanafi,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执行委员



Photo by Mona Abaza.

绿色(上方)：革命直到胜利！

红色(下方)：我们穷人将会定义革命，也将会定义暴徒和官员。

过去四个月以来，政治动荡震惊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突尼西亚和埃及的总统已经相继因为人民发起革命而被迫下台，并且这股潮流正蔓延向叶门、巴林、利比亚、约旦、叙利亚等国。不管我们怎么定义何谓革命成功，总之，这些革命很明显地迫使执政者在政治上做出改革。

这些革命起因于对社会改革与民主的渴求。我们别忘了，突尼西亚的革命有其历史根源：两年 before 在Gafsa，发动了一场抗议粮食短缺与失业的社会运动；在Jarjis的突尼西亚异议部落客和脸书使用者纷纷要求释放政治犯和开

放言论自由。不论是在突尼西亚或是埃及，革命都是由年轻的大学生和工人阶级所引发的，他们所诉求的也是社会与民主的改革。

这些运动者对于失业的敏锐、新自由主义与君主世袭政体的敌意，都与其对正义、尊严、自由的渴望有关；他们要求参政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批评烂政客的自由。别忘了，所谓突尼西亚的经济奇迹，只是北部沿海城市的崛起，从不包括南部的内陆地区。阿拉伯的青年发现他们已经变成了义大利哲学家Agamben笔下的Homo Sacer，所以，这是一场赤裸生命的反击，是手无寸铁的饥饿身躯的抵抗，因为国家机器完全剥夺了他们的政治身份与权利，例如，他们无法加入伊斯兰复兴运动(al-Nahda)、突尼西亚共产劳动党、穆斯林兄弟会等团体。



突尼西亚的总统本阿里，和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俨然就是独裁者。他们决定何时可以实施法律、何时可以终止法律，人民性命的生死也操之在其手上，彻底违背了各项人权理念：违法逮捕、刑求、谋杀、甚至拖垮整国的经济。

在我去年编的这本书The State of Exception and Resistance in the Arab World中，突国的社会学家Mohsen Bouazizi描述了该国年轻人对于政治现状的沈没反对，以及如何地冷漠与不闻不问。然而，他却忽略了Mohamed Bouazizi这样的人：来自和Mohsen一样的城市Sidi Bouzid，与社会如此格格不入，最后却变成这场革命的一用Touraine的话来说一主体。

Mohamed就像其他多数年轻人的身体一样，是独裁政权觊觎的对象：最终要完全剥夺其政治身份。所以，Mohamed选择以自杀式的手段来表达对独裁政权的抵抗，而这样的效果则在他自我牺牲的那一刻被彰显出来。如巴勒斯坦学者May Jayussi所言，我们和巴勒斯坦同为天涯沦落人；当巴勒斯坦人民在被占领的土地上与占领者对抗，而占领者百般想要羞辱他们，任意剥夺其生命，于是巴勒斯坦人起身反抗。Mohamed Bouazizi和其他的殉道者一样，其实是思虑审慎的行动者；他们牺牲生命的目的是为了推翻独裁政权。

然而，尽管本阿里不断地压迫和使用例外状态，这样的政体也不是毫无破绽，可以只手遮天。压迫统治通常是一个政府软弱的象征，就像我们可以看到如此“崇高”本阿里也无法控制自己手下的军队与警察。这个政府无法完全把异议消音，特别是那些少数团体的声音。因此，也就出现了一道希望的曙光，使民主成为可能的选项，并学习如何去利用政体的脆弱不堪翻转整个秩序。

这些阿拉伯世界的革命的确具有象征上的重要性。埃及的革命份子通常都是受过教育的年轻男性与女性、穆斯林与基督教徒。他们一边使用最新科技上网，一边手持着自制的运动标语。而这样的革命是非常在地化的，没有美国或其他国际组织的浮夸口号，或是精美陈置在五星级饭店的手册。另一方面，独裁政体的支持者则骑着骆驼、拿着刀子、砖块、棍棒而来。

而在这些革命之中，以阿之间的冲突也没有缺席。埃及和突国作为协调轴心国(the axis of moderation)的一员，其政治论述与民意大相径庭；人民认为协调就是准许以

色列的殖民计画与占领加萨走廊。我们会很惊讶的发现即使是支持政府的报纸，al-Ahram，也对穆巴拉克在1月4日接待以色列总理的作为有所批评；而前一天，以色列才轰炸加萨走廊，毁坏东耶路撒冷的4间民房，造成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所以，以色列之所以担忧阿拉伯的革命，其来有自。新的政府将有民意的基础，而不需西方强权的介入。甚者，埃及有可能重新恢复其在阿拉伯世界的主导地位，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对抗以色列的殖民计画。我在访谈时，受访的运动者不断提及“尊严”，这也正是独裁政府长期从他们身上剥夺走的东西。总之，这些革命给了我们新的启示，让我们重新去思考正在阿拉伯世界发生的是什么样的社会运动，以及内部与外部的行动者如何互动。

> 社运的行动者

在这些革命中，有两种行动者是关键。第一是受过教育、独立的年轻人。他们巧妙地结合政党和工会组织，给了这些革命强大的动员能量。第二是工人阶级，不论是工会成员与否。许多分析者往往忽略了后者，轻易地以为前者是不隶属于任何阶级，或是不带有任何意识型态的。事实上，在这两国发生的革命运动是传统的阶级运动和新民权运动的合流。除了阶级认同，运动者也在社会整合与非整合之间建构自己的身份认同，也就是Touraine所谓的承诺与非承诺。例如，某些四月运动的参与者同时也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但是他们对兄弟会很快地就和政府谈判这个举动有所批评。

在突尼西亚，Mohamed Bouaziz的行动激起了一波新的反抗，成为非组织性的自发运动，但却也马上被工会所控制主导。突国的总工会很擅长与政府交手。像是在北部，特别是首都，工会领袖一直在与政府谈判，但是在南部的工会却相当反对。此外，律师公会也努力地让参与运动的成员可以从年轻人拓展到所有年龄层，从地区到首都突尼斯。我们可以发现，从埃及到巴基斯坦，律师甚至是法官在此次革命中都相当活跃。

至于埃及，革命起始于第六次四月运动，在Al-Mahalla和al-Kubra由年轻人与罢工一起展开。他们用脸书、twitter、手机简讯动员了成千上万的群众，在1月25日那天走上街头，并由政治反对力量的帮助，在开罗的al-Tahrir Square、Alexandria、Swiss、Zakazik、Mansoura等地聚集了百万人。每个参与者都变成了记者，用手机记



录了政府的镇压行为，并躲过政府媒体的控制。的确，在运动发生其间，政治权利和民权的诉求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分野。执政者，甚至是阿拉伯或是西方的学者都认为只有伊斯兰政治组织有办法动员群众走上街头。这如今的例子则显示出，若伊斯兰组织不和其他反对团体合作，终究难以成事；伊斯兰运动必须超越类似这种“伊斯兰本身是迈向民主自由的唯一途径”的简单口号，并和其他反对运动结盟。

至于人权团体或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呢？许多赞助者和国际组织都认为这些非政治化的组织团体才是政治变革的主要推手。而事实上这些组织也扮演着辅助的角色，传播讯息、报导伤亡人数、游说国际强权，在正式与非正式的管道上，都有助于反抗独裁政权。因此，公民社会最主要的功用就是与政治反对势力协力合作。所以现在那些只强调NGO角色的人，除了要避免过度膨胀NGO的地位，也要强化他们与其他组织的合作，赋予新的任务。

与东欧和中欧的革命不同的是在阿拉伯世界的革命团体并没有一个单一的领导者。然而我们也见识到了没有领导中心的革命、没有组织的群众是如何自我改良的。大众媒体虽然不是最重要，特别是国内公家的媒体一在地误导大家时，我们会发现它扮演了传递资讯的关键角色。1月26日，埃及电视台还播出烹饪节目，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其他的媒体，例如Al-Jazeera、BBC Arabic和France 24则播放由运动者所记录的影像，并提供新闻分析。我必须指出，Al-Jazeera已经从对阿拉伯事务的“不介入立场”转变成为和阿拉伯人民站在一起，表达对政治的不满。

> 下一步

最后，我们只能希望这次成功的革命是迈向民主的开始——民主化是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进一步，人民或许开始知道他们不再只能在独裁者的利益和伊斯兰激进组织的恐怖之间做出选择。毛泽东言犹在耳：“通往天堂之前的是混乱，这是个最好的情势”。况且还要和掌权的军队势力谈判，可以预期的是，通往未来的道路仍然会相当颠簸崎岖。 ■

> 历史一隅

by Jennifer Platt, 出版副会长

正值筹备在墨西哥举行的年度会议(3月21-25)，且将与墨西哥的同事座谈，那么，现在来写一篇ISA在墨西哥的历史是再适合不过的了。1990年代以前，虽然拉丁美洲的ISA个人会员数只占了总体的4%，但是他们在执行委员会或研究委员会中的代表比例却不少，向来也总会有拉丁美洲的代表。Gino Germani (阿根廷，副会长，1962-6)和Fernando Cardoso (巴西，会长，1982-6)是最有名的两位。第一位墨西哥的会员是Francisco Zapata (1978-82)，从智利逃亡出来，他是被Alan Touraine所提名的；第二位则是Jorge Gonzalez (1994-8)。

值得一提的是1982年在墨西哥市举办的世界大会，会长是Ulf Himmelstrand，大会主题则是“社会学理论与实践”。当地筹备委员会由Gerardo Estrada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担任会长。参加的人数远远超过预期，所以必须临时印制大量议程；更重要的是，参加的人数绝对不只限于注册的人数而已。

学生对于会议的形式与内容都相当反对，因为只有少数的论文是处理墨西哥自己的问题。当时，对美援贬值以及银行的国有化都是很尖锐的问题。对墨西哥来说，社会学不只是一门学问，也是引领政治行动的一门知识。所以会议就临时在同一个会场中加开了讨论墨西哥社会议题的场次。而会议中几乎全程使用英语这点也饱受批评。在会场有许多人抗议、要求翻译成西班牙语(当时还不是ISA的官方语言)；其中一个口号是：“Cervantes yes, Shakespeare no”；其他场次也都被要求要这样做。ISA的经费当时无法(现在也是)进行同步学术口译，但是少数场次有提供给学生翻译服务。(Artur Meier是大会报告的撰写者，说这不只是语言冲突而已，还是关于美国霸权与帝国主义的文化、民族认同展现)。在1990年马德里的世界大会也有过同样的问题，最后ISA把西班牙文列为官方语言之一。 ■

> 与日本的社会学家站在一起

ISA执行委员会在此对日本大地震和海啸的罹难者表达最诚挚的慰问与吊唁之意。我们相信，日本将会以坚忍不拔、团结合作的精神度过这场难关。我们也向日本社会学做出承诺：2014年在横滨的世界大会一定会顺利举行。我们充分了解到这次盛会将会是百年来日本社会学的颠峰。另外，我们也特别感谢正值焦虑与痛苦之际，两位日本社会学会的成员，分别是会长矢泽修次郎和ISA大会当地委员会的主席长谷川公一，仍设法出席在墨西哥举行的会议。长谷川教授向执行委员会提供了完整的事件报告，我们在此全文刊出：



Disaster Prevention Center.
Photo by Koichi Hasegawa.

日本的东北海岸线本来是很美的，但是海啸来袭后，摧毁了每一个港口，冲垮了每一栋木造房屋，只剩下残破的钢筋支架。这张照片是南三陆町小镇的断瓦颓垣，那栋三层楼的半毁建筑是灾害防治中心。3月11日那天发生地震时，约有工作人员有30多名，但最后只有包括镇长在内的8人在屋顶上奇迹地获救。其他人都不幸罹难，包括了一名负责广播要居民赶紧撤离的员工。她的广播救了很多，但是自己却没能逃过一劫。图中新设立的电塔，代表了他们不愿向大自然低头的精神，也代表了他们重建日本的决心。

> 横滨—— 希望之港

长谷川公一，东北大学，仙台，2014世界大会当地委员会主席

3月11日下午，毁灭性的地震与海啸重创了日本东北的太平洋沿岸地区，我所居住的仙台市则是受创最严重的地方之一。我和我的家人幸运地逃过一劫。地震发生时，我正在处理ISA世界大会的预算问题。原本平静的星期五顿时之间成为了灾难日，前所未有的强震冲击了我和我的家人，以及整个地区。我的书籍和档案掉落一地，一瞬间我就困在这些掉落后迭了将近一公尺高的书堆之中。即使已经两个星期过去了，我仍然无法置信。这似乎是电影的剧情，不是真实的是界。

日本就像旧金山和洛杉矶一样，经历过好几次大地震。日本正好处在四个板块的交界上，所以某种意义上，地震经验就是整个日本社会的历史，而且日本人都很习惯了，总是做好万全准备。但是谁都万万没想到东北部会

发生连续多次的强震——5分钟之内发生了3次大规模地震，这也是为什么由9级地震所引发的海啸来得如此迅速与猛烈，造成了令人无法想象的严重灾情。

然而，若从地震的强度和次数来说，这个史上第4大的地震对人口密度如此高的日本社会所造成的损伤已经是最小的了。我们的社区所建造的都是可耐震的建筑，且学校和民众都定期地演习预防地震和海啸的措施。

至今没有发生任何动乱与抢劫，我感到相当骄傲。即使是最严重的区域、或是在东京，人们都井然有序地排队领取食物、水，和等待慢分的地铁。许多国外记者对于日本这样的文化、秩序在灾难发生时仍依然不变，感到印象非常深刻。

目前，2个星期过去了，已经有1万人死亡，大部分在沿海

地带；1万6千人失踪。这是日本当代史上最严重的天然灾害。

我们难道要等到下一个车诺比事件发生后才，日本的能源政策才会改变？

我们许多人都很担心福岛的核能反应炉，我也和其他环境社会学家一样坚决反对日本的能源政策。1996年我发表了一篇批判性的文章，名为A Choice for a Post Nuclear Society，呼吁政府终止核能计画。每当我受邀去演讲这个题目，我都会问一个问题：难道要等到下一个车诺比事件发生后才，日本的能源政策才会改变？很不幸地，我15年前的担心如今却成真了。日本政府并没有从三哩岛事件、车诺比事件、或其他相关事件中学到教训。很遗憾，也很无力。

> 会议场地很安全

我可以瞭解大家很擔心2014



長谷川公一，東北大學，仙台
2014世界大會當地委員會主席

我可以了解大家很担心2014年在日本举办的世界大会，而我在此也要告诉大家：你们届时一定会想来看看日本是如何从灾难中复苏的！日本的历史就是一步克服天然灾难的历史：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1945年二战后的广岛与长崎的原子弹，以及1995的神户大地震。

我们会议所在地横滨，以及场地横滨平和国际会议场(Pacifico Yokohama)并没有任何地震发生的历史。在地震发生后，横滨市告诉我说该栋大楼可以耐强震，且定期监测安全性。我们会议场地完全可以抵挡住地震的冲击。并且横滨从未发生过海啸。过去152年，只有几次大浪的纪录，而且没有造成任何灾害。横滨海湾的形状让海啸很难进入，民众对地震也有周延的准备。

> 尽力准备

当地筹备委员会由全国性的学者所组成，团队早在2008年就开始运作。17名成员来自日本各地，专精于各个领域。我们在日本社会学会和ISA执行委员会的合作过程中，充分学到了哥登堡的宝贵经验。至于会议场地则有两栋大厦，80间会议室，从一个会议室到另一个会议室之间路程最多不会超过10分钟。

我们提供了5个会议议题：

- 自然与人为灾害，当地社会的复苏。
- 低生育率、高龄化社会、变迁中的性别关系
- 公民社会：CSOs、NGOs、社运
- 东亚脉络下的压缩现代化与全球化
- 社会学的研究与教学

这些议题和大会的主题“面对不平等：全球社会学的挑战”非常贴切。我们将会强调东亚的视野，并和韩国、中国、台湾的学者合作。

> 希望之港

横滨平和国际会议场座落于Minato-Mirai，意思是“未来港”，也有“希望港”的意思。横滨向来是连接东西方、北亚和东南亚的中枢，是美洲和亚洲、亚洲和全世界的桥梁。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是通往世界希望之港；许多人也满怀希望来到横滨。横滨是日本的全球化都市，她多元、善变、充满活力，和各位印象中整齐画一

的日本有所不同。

我们唯一担心的是人数问题。上一届哥登堡有5000人参加，我们深怕因为地震所带来的负面观感，使得人数会大幅下降。

但我相信各位不是摇椅上的社会学家，而是勇敢探索社会真实面貌的学者。请大家鼓励你们的同事、朋友、学生来参与2014年的社会，来见证日本如何从灾难中复原。你们的承诺参与将是日本社会学会的最大动力。请一定要来，来亲眼看看日本社会的复苏。让横滨再次成为希望之港，成为勇敢的社会学家面对不平等世界、思索出替代方案的应许之地。横滨大会属于你们每一个人，谢谢大家的支持！ ■

> 多元典范下的全球社会学

by Sujata Patel, University of Hyderabad, 印度

全球对话开启了一场关于全球社会学的有趣辩论。我主要是想针对Ulrich Beck的“世界主义转向”(全球对话1:2和1: 3)和Raewyn Connell的论点(全球对话1:2)做出评论,并主要着重在以下三个主题上面:方法论世界主义、方法论国族主义、全球社会学。

如同Craig Calhoun所言,世界主义是个流行的概念。我不打算以各种典范来解释这个字,而是以最普遍常见的观点去理解它:意味着一种以各种形式去承认“他者”;或是如同刊物Public Culture在2000年的主编所说的:在这个广茅的网中,他抓住了某种互为主体性的意义与情境。毫无疑问地是只有当我们承认相互性与差异性,我们才可以在社会学分析的层次上,去结合Beck笔下所说的各种互斥的观点(南方与北方观点)。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Beck的方法论的世界主义没有办法承认来自南方的社会学理论呢?类似的问题,不只在Connell的南方理论中讨论过,也被其他许多来自全球南方的学者阐明过;而且这已经是一种学术的附属品,其意义在社会学教育和学习的过程中已经被不断地发掘出来。不论在课程中、在研究中、在期刊或书本文章的审查中、在发表或是何谓学术的杰出表现中,都可以发现其身影。

为什么这样的一种学术附庸性是如此普遍的呢?答案很多。我们可以从殖民主义和知识的形式开始讨论起。然而,在殖民主义没落后,以“被迷惑的心”(Syed Hussein Alatas的用语)之形式所表现出来的知识形式仍然相当普遍,也开启了许多现代性与社会学的理论讨论。许多学者都认为欧洲和北美的社会学理论仍然很族群中心,其欧洲中心主义限制了一种完全包容的知识形式(或许人们有时称

它为世界主义)。

欧洲中心的观点以其自己的观点去了解自己,认为自己从启蒙而来,开创了理性和人文主义的主体。有了理性和科学,人类便可以征服时空,确保人类进步得以持续。像是Arif Dirlik所指出的,欧洲中心主义意味着欧洲内部的文明进程,而不把现代性当作是一种经济制度(资本主义下的生产体制)、政治形式(民族国家的系统、以法律确保其地位)、社会组织(阶级、性别、种族、族群)、或是文化实作(休闲或过好生活);其不但是从欧洲内部浮现的,还透过了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才得以实现。可是欧洲的学者并不是从与殖民主义的关系来看待这个问题,而是以其内生的历史与语言之观点去解释。这样的观点持续被用来解释在欧美第二现代性的发展,以及方法论的国族主义。

> 方法论国族主义

对于方法论国族主义的批评主要以两个概念为主,分别是空间与地点。理论家企图在分析上将这两者加以区别,可是通常在使用时都会产生混淆。空间,指的是社会相互关系总和的一种抽象概念;地点,是一种物理位置,透过混合的社会关系而产生一种真实地点的社会意义。随着时间变化,这些地点会延伸出去,以意识或是相关的象征意义去认同自己(例如城市Buenos Aires或是民族国家South Africa),然后这些认同会建构出一种凝聚力,用来和其他地点/领土做出区别,例如像是国族(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超国族(印尼和荷兰)、或是地方城市的认同(Tahrir Square)。

方法论国族主义混淆了空间与地点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一点,当其不断地强调民族国



家、民族性、民族主义等概念只会对社会科学有负面影响时(不论是在理论或方法上),尤其明显。在那些曾是殖民强权或是帝国的国家(如法国或德国,也就是社会学的开山鼻祖的国家),上述批评或许成立,可是并不代表全世界都适用,因为,在被殖民之前的国家里(如印度),民族或国族主义的论述是有正面影响的。若我们对于印度社会学的发展历史有所研究,想必这一点就不难理解。

在印度,民族主义的论述曾经被用来质疑殖民主义的论述、质问在殖民主义观点下的人类学如何偏颇地把印度贬低为非现代的国度。民族主义的意识型态在独立前后,被用来审视那些殖民观点下关于印度社会的理论,检视其如何从外来者的眼光去看待印度,并提供一个内在的视角,产生新的社会学语言和欧洲的理论相互抗衡。当民族现代性的计画展开时,民族主义观点的社会学也在这个计画与发展的过程之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所以,在印度和其他前殖民国家,方法论国族主义从地点/领土的概念出发,并对抗殖民主义的论述。对地点的认同也让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可以对抗外来的殖民主义知识体系。再者,如此一来,产生的凝聚力也产生了论述的其他方案,并成为后来知识系统在政策和规范上全面制度化的原则。而这样的政策则决定了教育的内容与标准、研究机构的建立与执行、研究经费的核准、沟通思考的语言、专业组织的成立、以及奖学金的设置等。

这样的历史系谱应该与辩论中一直强调方法论国族主义负面影响的论点放在一起对照与评价。方法论国族主义不但没有限制了全球社会学的理论视野,反而还把它拓展了。另一方面,这样的观点也让我们让是到了全球社会学论述下隐藏的不平等结构,脉络化主流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这点如今仍然是很重要的。

我并不是说要把社会学局限在地点/领土或

是民族主义的层次,也不是要给方法论找麻烦,而是主流的社会学已经弱化了那些少数的、地方的声音与经验,并将之边缘化为西方的附庸。若20世纪末的社会学质疑国族这个概念,那他同时也是在宰制和普遍化其自身知识的基础。所以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概念,才可以容纳解释那些矛盾冲突的宰制/被宰制的过程(这过程也造成了知识体系的分殊化)?

>全球社会学?

当Beck问:“社会或政治理论要如何可能在理论、经验、方法、规范上,敞开视野去处理这种复杂且又质疑自身存在的现代性呢?”我是赞成他的。我们或许可以争论的是:“复杂现代性”这个概念是否适合用来检视自15世纪以来这个被资本主义体系结构化的世界;但是很清楚的是我们必须向前看,并抛弃自18世纪以来把世界简化成普遍(欧洲)/特殊(被殖民、民族)的二元理论。同时我们也要避开那些存在于我们文字与语言之中、且曾经迷惑人们的普世理论。

很不幸地,“世界主义”或“全球”等概念,在欧洲现代性之中有着很长的一段历史,并且承载了过多欧洲的历史与意义。我比较倾向使用“多元”(diversities),因为在包括英语的每个语言之中,它记可以代表简单的差异,也可以代表知识论与本体论上的根本区别。象征上,它也代表了分散,而非同质化。此外,在影响上(如本体论),这也可以避免把各个知识系统化约或是视为是他者的同类。而且这个概念也仍然有着相互关系的内涵,并且透过这个相互性的条件去建构自身。这个条件被各种空间/地点的动态与权力的网络所结构化。个体上,这没有所谓的好外;集体上,仍然是多元、差异、普遍但是相互连结的。他们代表且定义了自己,然后去评价各种社会学理论与实践上的差异。

现今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去开创这样一种语言和知识基础,当权力网络推动这样多传统的社会学时,好让我们能够可以辨识它。

> 面对不平等：墨西哥的国际辩论

by Raquel Sosa Elizaga,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 计画副会长



Goran Therborn, 计画委员, 在 UNAM 的会议上, 发表关于社会不平等的演说

2011年3月21日, ISA在墨西哥是召开执委会, 会中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政治与社会科学系的教授集合了墨西哥、拉美、以及世界各地的学者们, 一起针对不平等进行辩论。在三篇演讲里面, Micheal Burawoy会长、Rolando Cordera和Goran Therborn探究了不平等研究在社会科学中的范围、起源、发展, 以及对当代世界的启示。

三个小组讨论包括了来自各地的18位学者对于不平等、知识不同的社会与文化表现形式、不同地区的观点等的理论议题, 进行了相当全面的介绍。我们也讨论不平等加深的危险、如何组织社群对抗不平等, 因为过去近30年来, 这个问题不断地恶化。

从一个批判的角度而言, 我们正徘徊当代文明发展的十字路口上, 滥用天然资源、破坏环境、危

害到了整个人类与地球的存续。从战争与灾害的经验来说, 所有的参与者都一致了解和承诺要避免过度掠夺资源, 然后寻找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 才可能保护人类的生存。

在每一个场次里, 复杂交织的不平等现象, 诸如歧视、种族主义、对女性的暴力、对边缘需要的无视、否认文化多元性、新族群的兴起、派系与阶级等等, 都被提出讨论。我们是可以善用各个国家的讲者(印度、南非、墨西哥、拉美、黎巴嫩、日本、美国、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西班牙、菲律宾、瑞典、法国、俄国、英国)对于不平等的理解与知识的。这其实是对在多元文化脉络下的不平等的程度和意义进行一次很有启发意义的审视。这也敦促我们不但是要找到自己的解释, 还要提出解决办法。

最后, 讨论的重点还包括了正义的概念, 涵盖了John Rawls、Amartya Sen, 以及社会学者Goran Therborn、David Harvey、Pierre Bourdieu; 我们对于不平等与排除的关系、不平等与暴力、不平等与权力、不平等对公共领域组织之影响等议题的理解, 也显示了我们的学科观点的确有其限制。此外, 我们迫切需要社会学积极地介入公共辩论中。

总之, 这是我们对于不平等所举办之论坛、工作坊、研讨会等的第一部, 而且2012在Buenos Aires的世界论坛与2014年的横滨大会将会延续这个议题。这应该能带给现在正在复苏中的社会学一个崭新的方向!



> 执行委员会会议 2011年3月21-25日，墨西哥市

by Michael Burawo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会长



ISA执行委员会 UNAM, Mexico
City的植物园内合影

究委员会、会员的关系上，皆希望如此。所以我们会定期在全球对话中刊出会议报告，就像这份文件一样；此外也会跟大家报告执委会的重大决议事项。我们也会讨论政策制订和审议的原则，以及如何解决利益冲突的问题。

我们一致同意设立一些委员会去处理社会学家的人权问题，社会学家的早期生涯，ISA的奖项，以及ISA加入其他国际组织等议题。

以下是各位副主席的报告总结：

Margaret Abraham，研究副主席

研究协调委员会(RCC)在墨西哥市的会议成果颇丰。我们处理了在哥登堡会议时所讨论出的问题，包括要将RCC的目标与要求上线，成立RC的会员人数下限从25人提升到50人、工作团队(WG)则是25人。Margaret Abraham报告了关于Congrex (以RCs、WGs、TGs为基础)以及2012年Buenos Aires的论坛。RCC讨论了这些议题和其他RC的相关问题，还有RC51的选举。此外，也处理的两个TG的新计画：(1)制度民族志；(2)理性与社会。前者已经通过，后者仍在审理中。会

ISA的执行委员会在墨西哥市召开了为期5天的会议，主要由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政治与社会学系的教授所接待，其中特别感谢Fernando Castaneda Sabido博士，是墨西哥社会学会的会长，以及Raquel Sosa Elí zaga博士，是ISA的计画副会长。5天的会议从计画委员会会议起头，然后是出版副会长Jennifer Platt主持的出版委员会会议，接着财物与会员委员会会议由Robert Van Krieken所主持；国家联络委员会则是由副会长Tina Uys召开；研究委员会会议是副会长Margaret Abraham所主持。整个执行委员会在最后2天召开全体会议。同时，其他各个委员会也都举行了精彩的会议，透过墨西哥和ISA的社会学家，一起处理“面对不平等：当代世界的挑战”此

一议题，设想在横滨的世界大会可能会讨论什么样的议题。

我在会议中报告了在哥登堡大会获选为会长后到各个国家拜访的经验，以及本会的数位世界之进展：通讯《全球对话》目前每天刊出6期，以9种语言发行；开放大学“全球社会学Live!”；致力于行动的Sociotube；以及我们的部落格：危机中的大学。这些现在都被广为接受，而且我们还有脸书的专属页面，吸引了很多人前往。我特别强调了由全世界年轻社会学者所组成的工作团队角色。

我一部份对于数位世界的信念是在创造出更大的开放性与透明度，不论在执委会的运作、或是与国家学会、研

议的重点还是放在RC的计划审查以及2011的经费申请。

Jennifer Platt, 出版副会长

ISA其刊载投稿、销售、传递的方面都运作得不错。但是编辑的工作量增加了,而且某些地区性的经费补助被删减。现在有一个成功的标案,用来补足多出的支出。有一册书将会出版东北亚学者的翻译文章,以配合2014年的横滨会议。

在截止之前,没有人申请成为International Sociology Review of Books的编辑。我们决定延长申请时间,并鼓励各位踊跃申请。Current Sociology的编辑为作者开了一场工作坊,并在墨西哥召开了一场“与编辑会面”的会议。相关的活动将尽可能地在各个会议和训练活动中举行。

Raquel Sosa, 计画副会长

2014年的横滨大会由会长、研究和国家学会的副会长、4位执行委员、当地筹备会的主席、6位各个领域的专家、学术传统或是地区的代表所组成。此大会委员会由计画副会长担任主席。主要任务是规划横滨的会议主题,组织各个场次,作者面对批评者的场次、整合场次等等,以呼应大会主题:面对不平等,全球社会学的挑战。

第一次会议,计画委员会决定了议程和4个议题:不平等的多元分析、不平等的动态、正义相关议题、解决不平等的替代性方案。我们希望这样的方向可以刺激研究委员会和国家学会,将为学术知识注入丰富的能量,处理

当代最迫切的问题。

Tina Uys, 国家学会副会长

国家学会联络委员会(NALC)讨论了定期团体会员的申请和网站的发展、区域会议的经费。从阿根廷、孟加拉、爱尔兰、黎巴嫩和莫三比克的社会学会已经被核准通过加入。会员也被指派去联络新的会员国。

当在讨论经费申请时,我们认为去厘清两项经费的用途是相当重要的。网站发展经费是用来协助各国学会去建立网站用的。网站的更新相对来说就不太重要。我们也决定各国学会用ISA的官方语言之一建立网页。地区会议的经费是用来提供给跨区域或跨国对话用的。这两种经费都核准给予阿尔巴尼亚社会学会和吉尔吉斯斯坦社会学会。西班牙和葡萄牙学会则获准拿到了一个地区会议的经费。我们也决定进度报告和经费的申请核准状况要在接下来的会议中讨论。

2013的NALC会议计画已经开始对外征求。我们也开始讨论可能的议题。最后,NALC认为作国家学会的历史、会员、活动、结构、限制,可以对国家学会有所助益。

Robert Van Krieken, 财务与会员副会长

本委员会再2011年3月22日开会,并在25日向执行委员会报告。在考虑过一些会员议题,诸如A、B、C三类的终身会员会费的区隔,B和C类会员增加之后,次级委员会的会员身份等议题,将在2012的EC会议中提出讨论。

就像NALC一样,财政和会员委员会同意了定期团体会员资格的申请。两个将要举办的会议:2012在Buenos Aires的论坛和2014年的横滨大会,其合约和预算的问题也被提出讨论。

我们也决定为在更新会员身份时的捐款做好准备。2011年的暂时性预算将会依照国家学会、研究委员会、会长的全球对话、出版委员会的经费申请情况而作调整。

最后,我们会公布2010年的预算总结。

其他事项

我们讨论了前往联合国(Jan Fritz、Rosemary Barberet、Rudolf Richter),法律社会学国际机构(Ramon Flecha、Benjamin Tejerina)、全球发展组织(Emma Porio)等组织之代表的报告;我们也聆听了Tina Uys关于Johannesburg博士生实验室的进展;也整理了来自日本社会学者关于凝聚力和2014年横滨大会的解释。最后更谢谢地主热情好客的招待,以及ISA秘书处不辞辛劳地安排整个会议。ISA将与更多的会员与活动一起向前迈进! ■

> 无国界社会学

by Judith Blau,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无国界社会学
Alberto Moncada, 无国界社会学会长



┆ Judith Blau, SSF会长

无国界医生(M é decins Sans Fronti è res; SSF)毫无疑问是全球化推动下之无国界运动的先锋。这样的名单我们很难穷尽,但也代表了运动的广泛性:建筑师、小丑、工程师、农民、僧侣、音乐、报导、足球、老师等都有无国界组织。

无国界社会学(Soci ó logos sin frontera; SSF)便属于这个普及的运动。它于2002年在西班牙成立,然后拓展到其他国家,如巴西、智利、伊朗、义大利、马来西亚、波多黎各、美国等。就如同其他无国界组织一样,其使命的重点在于对于世界上的每一位其他人都有责任,并着重在人权、民主、经济平等、永续发展等方面,并对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有很深的批判。由Michael Burawoy所倡议的公共社会学则是我们相当欢迎的概念。

在合理的程度上,社会学变动得很慢。几十年前,主导美国社会学学术界的实证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鲜少遭受

到质疑。但是在1970年代,女性主义(美国的Sociologists for Women in Society; SWS)和非裔美人观点(美国的Association of Black Sociologists; ABS)兴起之后,情况就有所不同。美国社会学会(ASA)的马克思主义小组也常常提醒着我们世界是很大的。ASA新成立的小组也并非中立的,像是老年与生命历程;利他主义、道德、社会连带;小孩与青少年;行动不便与社会;教育等小组。我们很难想象研究孩童的学者对于社会福利是毫无立场的,而且有些学者是真的非常为孩童的福利着想的。换言之,公共社会学在美国学界是相当普遍的。

那么SSF的美国分会在美国的社会学界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第一,我们有一个全球的线上讨论区(<http://ss-fthinktank.org/>);第二,我们在美国人权联合会有组成顾问,推动科学的发展,这是ASA无法做到的。第三,我们可以“游说”ASA,这也是ASA自己没办法做的。已经有两个提案决议被ASA执

委会审核通过,分别是人权宣言,和遭受危险的社会学家保护案。我们也出版自己期刊:Societies without Borders (<http://societieswithout-borders.org/>),和本会宗旨符合,是免费开放的。

我们独立于ASA (但是好朋友)是很好的,也我们“无国界”的精神相符。我们可以处在比较不同的位置去行动。那我们赞成资金和资源自由流动到全球南方吗?当然。我们赞成终结帝国与霸权吗?当然。我们反对私有化吗?当然。我们赞成人自由地迁徙,不受国界的限制吗?当然!



> 编辑委员

主编: Michael Burawoy

执行编辑: Lola Busuttil、August Bag ù、Genevieve Head-Gordon

副主编: Margaret Abraham、Tina Uys、Raquel Sosa、Jennifer Platt、Robert Van Krieken

编辑顾问: Izabela Barlinska、Louis Chauvel、Dilek Cindoglu、Tom Dwyer、Jan Fritz、Sari Hanafi、Jaime Jimenez、Habibul Khondker、Simon Mapadimeng、Ishwar Modi、Nikita Pokrovsky、Emma Porio、佐藤嘉

伦、Vineeta Sinha、Benjamin Tejerina、伊庆春、Elena Zdravomyslova

区域编辑

阿拉伯: Sari Hanafi、Mounir Saidani

巴西: Gustavo Taniguti、Juliana Tonche、Pedro Mancini、Fabio Silva Tsunoda、Juliana Oliveira Carlos、Andreza Galli

印度: Ishwar Modi、Rajeev Gupta、Rashmi Jain、Uday Singh

日本: 芝 真里、塩谷芳也、姬野宏辅、高见具広、速水奈名子、岩馆豊、池田和弘

西班牙: Gisela Redondo

台湾: 何经懋

> 庆祝土耳其社会学会20周年

by Birsen Gökçe, 土耳其社会学会会长



Birsen Gökçe 在土耳其20周年年会上发表演讲

土耳其社会学会在1990年于Ankara成立。一开始只有40名会员，如今则已经多达600人。该学会没有任何分会。20年前成立时就因其国家级的科学研究而享誉名声。

本会已经执行了22项研究计画，举办过20场会议，出版22本出，和非政府组织开过很多次会议了。甚至从1998年开始我们就在土耳其文和英文的期刊Journal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出版了130篇科学文章，包括了10项翻译和8项研究计画。

除了推动学术研究，学会也传播知识，重视与社会的互动。我们也和许多自发性的组织、基金会、学会合作，投身与社区的相关活动。我们也和国家与组织的组织一起从事研究。在这个观点下，学会受到了家庭与社会研究部、安那托利亚地区发展部(GAP)，和健康部的支持，进行研究案。学会也受到来自于土耳其科技研究部(TÜBİTAK)、联合国国家发展部(UNDP)、欧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北约(NATO)、世界银行的支持，进行多向研究案。

学会最重要的活动是举办全国会议。至今已经办共6次，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安托尼亚社会系学者合作研究土耳其的社会经济问题。这样的大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知识交流平台，也提供了前辈和年轻学者一个沟通管道，或是让从不同地区或和相关学科来的学者齐聚一堂。

第一次会议是“当代社会发展”，1993年在Izmir的Ege University举行，也就是学会成立的3年后。第二次是1996年在Mersin University讨论“移民”。第三次是“土耳其与世界的新社会学挑战”，在Eskişehir的Anadolu University (2000)举办，强调异化、冲突、整合。第四次在2003年Sivas的Cumhuriyet University举办，主题是“土耳其的社会问题”。第五次是2006年在Malatya'nın İnönü University。2009年是第六次，在Adnan Menderes University讨论“社会转型与社会学方法”。

社会学一开始是哲学系下的附属品，并毫无反省地套用西方社会理论，也无视学生其实不太了解、并感到陌生疏离的事实。今天情况有改善，因为我们都用科学的方法去检视问题。的确，当代社会学用了社会科学中各家方法，是有可能集大成的，但不幸的是相关的其他学科如经济学、法律、心理总是忽略土耳其的社会现象。

如今社会大众因使用社会学这个名词，是因为它具有某种魔力。记者、专栏作家、政客、

任何人都想成为是社会学家。其实我们应该要知道，人不是因为生活在社会中学习，就会成为社会学家的。我们常听到一种说法：我在乡下出生，但我对乡村社会学一点概念也没有。

我们的目标是用社会学帮助年轻人，在公共场合传播社会学的想象。有了这些社会学理解，社会学研究所的学生就假定了学术训练和给予政策制订者建议的重要性。

在“5年发展计画”的这段期间，社会学的毕业生是否有工作、以及是否在公部门工作，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但是，由于1980年就业法案的变迁，社会学研究生失去了许多公职的机会。学会从一开始就企图去反转这个结构。即使是今天社会学硕士也只能在特定的6个公共机构任职而已。上个月，在历经了漫长的政治过程后，国家通过了法案，让更多的社会学毕业生到各种公部门工作。

21世纪才刚刚开始，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所以，我们要焕然一新。最后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必须克服在推动社会学普及化到社会时所面临的阻碍。

谢谢大家的参与，祝学会20周年愉快！

(本文为演讲的简短版)

> 欧洲各国的社会学组织

by Roberto Cipriani, ESA国家学会会长

2010年10月28日，来自21个国家的社会学会代表到巴黎参加欧洲社会学会组织的会议，欧洲社会学会(ESA)的会长Anália Torres、前会长Claire Wallace、ESA的执行委员会皆出席此会议。欧盟执行委员会的科学、经济、社会研究所的主任Jean-Michel Baer和来自欧洲科学基金会的Rifka Weehuizen。

ESA有两大主干：研究网络会(Research Networks)和国家学会(National Associations)。在法律上，国家学会扮演了ESA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们负责提名执行委员会和会长的候选人。

在这里简短报告一下国家学会的特色。

歐洲各國的社會學會

· 德国社会学会有2500名会员，并提供团队研究的基础。的确，他们在这几年变得很专业，在欧洲推动学术的角色上相当积极。

· 挪威社会学会在透过网络连结人们这点上，贡献良多。

· 土耳其社会学会在1990年成立，有500名会员。自从土耳其申请成为欧盟成员之后，土耳其的社会学者更注重在西方社会学。

· 罗马尼亚有激进社会学，想促进社会发展，领导制订政策。他们越来越着重在微观社会议题，但却忽略了全球性问题，使得社会学变得有点孤立。研究机构减少了，但是建立了以网路为主的审查。

· 法国社会学会相当年轻，2002才成立，但是有1000名会员，40个研究组织。

· 葡萄牙社会学会有2600名会员，在社会与学术上都有其重要性。他们试图想要把教学、研究和在企业工作的人聚集在一起。

· 芬兰的西方学会(Westermarck society)于1954年成立，期刊于1965年发行。

· 瑞士社会学会有550名会员，20年来向来如此。该学会有12个研究委员会，在ESA举办会议的空档也会举办会议。该会有多个官方语言，举办的会议有三种语言(法、德、英)，出版的期刊也是。

· 匈牙利社会学的组织规章最近历经变革，现在并可以提出自己的研究计画，并且每年举办会议。

· 奥地利有许多他们自己发明的职业，少了点整体的认同。博洛尼亚进程(Bologna process)导致了分裂，因为学士与硕士学位的内容差很多。

· 西班牙社会学联盟(Spanish Federation of

Sociology)由西班牙各个地区的组织自发组成。各个地区的组织都会举办许多活动，也发行各种期刊。联盟也定期办会议，发行期刊。

· 有半数的英国社会学会成员和半数的社会学博士不在社会系教书。英国的学费政策变了，有许多大型的抗议活动。总之，念书变得很昂贵。

· 义大利的大学正在经历组织与财政的双重危机。组织的部分影响为何，还很难评估，但是一提到薪水，财政问题有显而易见。

· 在波兰，社会学颇负盛名。其认同的地位在共产时期就建立起来，并且越来越多人想修读社会学的学士获硕士学位，这意味着来自其他领域，对社会学未必熟稔的学生都对它很有兴趣。

· 塞尔维亚社会学会是非营利与非政府的组织。其研究计画被财政问题与族群分歧所阻挠。塞尔维亚共有25个族群。

· 丹麦的各行各业薪水都很高，所以学术界有人才外流的现象；而且学术的标准门槛太高，学生要进入大学相当困难。

· 马其顿社会学会很迷你，由主要的大学所组成，也有学术性的旨趣。

· 阿尔巴尼亚社会学会有130人，定期举办年会。

· 俄罗斯有3个社会学组织，都在莫斯科。社会学有一定名声，且社会学家参与政策制订。

· 以色列的社会学从1948年就建立了，社会学规模很大，每年的年会都有1000人左右参加。

这就是欧洲社会学会的现状！

> 到底社会学家犯了什麼罪？

by Frédéric Neyrat, University of Limoges



宪兵以及Pinar Selek

或许人们认为社会学已经是个成熟的学科，只需要提出科学的问题即可。但是，在Limoges最近的一场座谈中，社会学所要面对的政治迫害成为了重要的议题。社会学在其他领域(如政治学、媒体、法律)的非科学观点中已经名声败坏了。

有两个例子可以用来解释社会学所遭遇到的麻烦。一定要提的就是Pinar Selek的例子。她从1998年开始就被控告用炸弹攻击Istanbul的一个市集。所有的报告都指出爆炸起因于瓦斯外泄，而法院也3次宣告她无罪(最近一次是2011年2月)，但是检察官还是不断上诉，最新的这次也是。我想Pinar Selek所犯的罪，是她犯了挑战了库德族问题禁忌的罪。她访问了PKK的

军队并且拒绝把名单交给警方，于是遭到逮捕和刑求。对于土耳其官方和警察而言，去质疑民族的神话，或是碰触库德族或是美国等问题，的确是犯罪行为。

第二个是匈牙利的例子。新的民族主义针对Agnes Heller及其“党羽”(其他4位哲学家)发起了一个仇恨与反犹的媒体战争，主要是因为主流匈牙利媒体指控其有世界主义的阴谋。81岁的Agnes Heller是一位哲学家与社会学家，是Georg Lukács的学生。她在许多不同的国家教过书，1970年在美国New School担任Hanna Arendt Chair，避免共产党的迫害。今年初她和同事被指控不当挪用200万欧元于模糊且无用的文章。这种未经证实的指控污蔑了她的名誉，说她玷污了祖国的文

化。说穿了，这一切不过就是冲着她的政治行为而来的。她和其他许多的知识分子一样，坚决反对新的匈牙利律法，并批判Viktor Orban的威权统治。

若社会学家会如此无辜地遭到波及，那是因为政权发现社会学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威胁。社会学处理那些国家永远忽视的议题，并且挑战了政府文宣的真实性。社会学家总是被当成异议分子而被攻击，即使社会学家是遵照着韦伯所说的学术伦理。所以，就是因为社会学对科学的信念与承诺，才会被当作代罪羔羊。

